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 机制创新和历史启示

雒亚男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反贫困斗争,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赢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党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在实践中探索创新贫困治理机制,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内容丰富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工作方针和治理机制。总结弘扬百年反贫困取得的宝贵经验、精神财富和思想成果,对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党的伟大事业行稳致远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反贫困 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2021)04-0019-08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习近平指出“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19)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反贫困斗争,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百年反贫困奋斗历程充分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政治优势,极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百年反贫困的伟大成就坚定了全国人民的“四个自信”,为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发展基础。百年反贫困的宝贵经验对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高贫困治理和治国理政水平具有重要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奋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是一部党带领人民反压迫、反剥削、反饥饿的革命史,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奋斗史。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为解决近代中国贫困问题找到根本出路

鸦片战争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人民深陷贫困的根源。为了反饥饿求生存,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不论是统治阶级发起的洋务运动,还是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等,抑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先后发动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没能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了光明前景。马克思认为,以私有制为主的生产关系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导致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的根源,进而指出了解决贫困的基本途径: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消灭剥削,剥夺者被剥夺(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2012)。这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和反贫困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导。在中国人民反压迫、反贫困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党一经成立就把反贫困斗争作为自己的重要使

作者简介: 雒亚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西部贫困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航空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19JZD003);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重要论述的陕西实践”(项目编号:2020KRM088)。

命。从此,中国人民反贫困斗争便有了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

中国共产党在分析把握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土地革命运动,为解决近代中国贫困问题找到了根本出路。旧中国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占人口不到5%的地主和富农占有50%的土地,占人口绝大部分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仅占有一小部分土地。党牢牢抓住土地这一最关键的问题,使武装割据、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三者相辅相成,“打土豪,分田地”,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挖除了贫困根子。1936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出,“实现土地革命的意义,不但是给占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解除封建的剥削,而且同时就是推动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强大民族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解决好土地问题,为党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新中国贫困治理奠定制度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初,是世界上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家之一。当时国有资产只有130多亿元,40%~50%的人口处于深度贫困(王灵桂、侯波,2019),农业人口超过80%,文盲率超过80%,人均寿命不到35岁(蔡武,2006)。带领如此庞大的贫困群体摆脱贫困是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一穷二白”的国情,加快恢复国民经济发展,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稳定物价等措施加大社会民主改革,通过“一化三改”加大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阐明“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

1950年6月,党中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使近3亿无地或少地农民分到土地,但这一时期的农民总体上仍处于生产资料缺乏和生产条件落后的状况。为发展生产,党大力推行农业生产互助,建立国营经济。1953年11月,全国43%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织,1956年达到96.3%(任希贵,1994)。“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新中国贫困治理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全面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提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主张,优先发展工业,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改善教育、医疗水平,逐步完成两个“五年计划”目标。尤其在农村通过建立三级所有制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集体化生产,不断解决群众基本生活问题,发展科教文卫事业,促进人民群众平等享有社会公共服务。1952~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人口由5.4亿增长到10.2亿,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7岁(王灵桂、侯波,2019)。这一时期,党实行以计划分配为特征的救济式扶贫,中国反贫困事业进入了制度性治理轨道。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拓展发展式扶贫新天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拉开了发展式扶贫的序幕。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这一重要论述为贫困治理提供了行动指南。

1978年,面对中国农村7.7亿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97.5%的严峻局面(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5),党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特别是取消限制劳动力使用的制度约束,11%的乡村劳动力转向乡镇企业,农民收入快速增长。1982年,“三西”专项扶贫计划正式启动。1984年9月,中央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明确指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要因地制宜,发展商品生产,农产品流通管制和价格逐步放宽。从1978年到1985年,农产品综合收购价格指数提高了66.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32%。党在这一时期推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超过1亿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吴国宝等,2018)。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制度框架。推进贫困治理机制改革,明确开发式扶贫基本方针。1994年,党中央公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解决8000万剩余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温饱问题。按新的贫困标准重新确立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在一系列扶贫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全国贫困县农民收入从1994年的648元增加到2000年的1337元,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2003),基本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

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在农村主要推行“四减免、四补贴”等惠农政策,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改革和完善贫困治理机制方面,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对深度贫困地区实行整村推进,重点改善困难地区和低收入群众的生产生活,将扶贫资源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逐步确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实现全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覆盖。截至2010年底,全国5214万农村人口享受了低保,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688万人(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3),城乡救助体系基本建立,全国人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我国总体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开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机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和实践。

2012年底,习近平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党中央鲜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诺“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省湘西州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开创了贫困治理新机制。他反复强调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贫困堡垒,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在他亲自领导和部署下,精准扶贫制度安排迅速落地实施。按照“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具体要求,开展健康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实施贫困村提升等十项精准扶贫工程,坚持因地制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采取精准脱贫措施,确保了贫困治理的有效性和长效性。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我们必须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向贫困发起总攻,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6)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组织开展脱贫攻坚人民战争,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党中央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历经八年奋斗,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的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习近平,2021b),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下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精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习近平2021b),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机制创新成果

在百年反贫困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科学合理、内容丰富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工作方法和治理机制,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是党治国理政的成果,也是对国际减贫事业的贡献。

(一) 党的坚强领导为百年反贫困取得伟大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

中国减贫的规模和速度创造了人类减贫历史上的奇迹。纵观百年反贫困历程,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首先,党的领导体现在政治保证上。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反贫困理论和工作方略,特别是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

其次,党的领导体现在组织保障上。习近平(2020)同志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脱贫攻坚,加强领导是根本。”党始终把反贫困放在党事业发展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扶贫攻坚战中,习近平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0多次调研部署扶贫工作,带领五级书记一起抓,形成“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为夺取脱贫攻坚胜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最后,党的领导体现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上。党在反贫困斗争中始终贯彻“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工作方针,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做贫困群众“贴心人”、脱贫攻坚“带头人”、脱贫致富“领路人”,开展党员结对帮扶活动。在脱贫攻坚阶段,全国就选派了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每年保持近100万人在岗开展驻村帮扶,用实际行动兑现带领人民脱贫致富的承诺。

(二) 将反贫困纳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盘谋划是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制胜方略

贫困是由经济、政治、社会和人文等诸多因素交织的复杂问题,必须采取综合的、系统的、长期的机制性治理措施来解决。

首先,党把反贫困和贫困治理纳入各个时期的总任务统一部署。从带领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到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皆体现了反贫困的要旨和任务。改革开放以后,党把扶贫开发置于“两个百年”战略目标中加以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将扶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部署,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创造了世界减贫速度的奇迹。改革开放40多年将贫困发生率降低到3%以下。美、英、德、日等经济发达国家用100多年时间才降至10%(吴宝国等,2018)。

其次,党将贫困治理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同步推进,将治理机制创新置于国家改革和发展之中进行整体设计,不断优化扶贫开发政策措施。1986年以来,党中央持续通过七个“五年规划”,将减贫寓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体推进,为贫困治理创造了制度环境和综合条件。

最后,将扶贫攻坚作为强国富民的突出任务,采取超常规举措攻坚克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明确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决战区域性整体性贫困痼疾,贫困地区发展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扶贫攻坚战中全国新建农村公路110万公里,贫困地区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2021),贫困地区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三) 坚持精准施策为反贫困开创务实高效的路径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反贫困和贫困治理当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针对国情民情的发展变化,因时因地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和创新贫困治理机制。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贫困治理中的根本问题和主要矛盾,抓住土地、经营权、农民负担、保障兜底等突出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优先解决群众最迫切、最关心的事情。

其次,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切实提高扶贫效果。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先后实施救急式扶贫、放权搞活、以工代赈、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等扶贫方式。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断完善社会救济保障制度,建立健全贫困治理机制,从根本上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一个都不掉队。脱贫攻坚战以来,近2000万贫困群众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养,2400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生活和护理补

贴, 790 万户群众的危房得到改造, 960 多万人搬入新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 。

最后,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绩效导向, 不断提高贫困治理能力。“花小钱, 办大事, 花对钱, 办好事”, 确立精准脱贫方略, 科学地解决了“扶持谁, 谁来扶, 怎么扶, 如何退, 如何稳”等关键性问题。把目标管理、标准管理、程序管理、绩效管理引入工作全过程, 极大地提升了扶贫综合效应, 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新发展。

(四)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基础作用为反贫困提供持续发展动力

党在反贫困实践中, 十分重视通过制度安排、政策引导、市场激励等多种措施, 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向扶贫开发地区流动, 通过输血带动造血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首先, 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实行中央主导的、有计划的、具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政策, 创新财政支持体制, 不断扩大财政投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近 1.6 万亿元专项扶贫资金, 为完成脱贫攻坚目标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

其次, 推进资本市场参与扶贫。引导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从早期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互助基金, 到利用综合性精准扶贫金融政策推进发展普惠金融, 充分利用金融工具增加对扶贫的投入。脱贫攻坚战以来, 贫困地区获得土地增减挂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 4400 多亿元, 获得各类扶贫贷款 10 多万亿元。

最后, 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 激发市场主体增加投入。改革开放以来, 党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引导具有技术、资金优势的各类市场主体对接贫困地区资源和劳动力优势, 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创造就业机会,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为反贫困凝聚磅礴力量

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八方的动员优势, 组织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担扶贫职责和义务, 通过协作帮扶机制, 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大扶贫格局。

首先, 加强东西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注重发挥东部省份先行优势, 落实帮扶责任。落实西部贫困地区主体责任, 扬长补短, 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东部九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 1005 多亿元, 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投资达 1.1 万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 , 形成“东西互济、协调发展”的扶贫格局。

其次, 开展定点扶贫。各级党政群机关开展定点帮扶, 军队与贫困村结对帮扶, 各单位主要领导深入扶贫第一线, 选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扶贫点挂职帮扶。在扶贫实践中了解民情, 转变工作作风, 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最后, 建立社会扶贫机制。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积极广泛参与扶贫行动, 展现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如“万企帮万村”“希望工程”“母亲水窖”等社会扶贫项目取得良好效果, 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 更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了借鉴。

(六) 坚持群众主体地位为反贫困培育强大内生动力

党在反贫困实践中,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通过贫困治理的引导和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成为贫困治理的主体力量。

首先, 充分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反贫困的重要原则和价值取向, 即以群众的观点分析问题, 以群众的方法推动工作, 以群众的利益检验结果。引导群众树立主体意识, 扶贫与扶志相结合, 激发群众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 靠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

其次, 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支持贫困地区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纾解贫困地区“小农生产”发展面临的技术、市场、信息和资金约束, 支持贫困地区龙头企业、合作社、生产基地的发展壮大,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最后, 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作用。把群众组织起来, 解决分散经营面对大市场的弱势

地位。通过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丰富文化生活,改善农村精神生活,发挥贫困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乡村文明建设。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史启示

习近平指出“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中国历史研究院,2021)。百年反贫困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为开启贫困治理新征程、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及党的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历史启示。

(一)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是党永葆青春的活力之源

取得百年反贫困的伟大胜利,根本的一条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深刻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

一要紧紧依靠人民。始终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6)作为党执政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集中民智、反映民情、顺应民心、回应民意,把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事业上来。

二要不断造福人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紧抓在手上,切实托住这个底,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三要牢牢根植人民。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毛泽东,1991)。如果脱离群众,“民心工程”就会变成“窝心工程”,必须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假大空”,反对背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反对危害群众的权力异化和腐败。

(二) 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目标,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是党的事业走向胜利的制度优势

实现共同富裕是反贫困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习近平(2021a)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一要完善分配机制,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要把共同富裕理念更好地贯彻到国家治理机制中去,消除机制不畅、措施偏差带来的分配不公现象。改革和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统筹效率与公平的优势,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二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更充分更平衡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坚持“全国一盘棋”,逐步缓解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不平衡问题,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保障低收入群众的生活。实现共同富裕,重点是解决好低收入群众的生活问题。要通过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保障措施,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促进低收入群体稳定就业,实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三) 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用发展的方式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加快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在百年反贫困实践中,党始终把发展摆在核心位置。习近平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取得反贫困斗争的胜利,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地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中去。

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主导布局、统领全篇。切实解决当前创新能力不足、农业基础不稳、城乡差距较大、生态环保和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突出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下好这盘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既要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也要把握工作着力点,加快培育提升内需体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三要塑造发展新优势。坚持创新驱动,坚定走科技自立自强创新发展道路,加快建成创新型国家。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四) 始终坚持完善贫困治理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方略

在百年反贫困实践中,党始终把重点放在农村。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农村是重点。加快建设现代化强国,农业现代化是难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势在必行。

一要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保持政策不变,力量不减,根据条件和任务的变化,对治理机制和帮扶政策进行梳理创新,克服临时性、碎片化缺陷,综合应用政策工具和市场机制,增强政策的杠杆效应和集成效果。统筹谋划产业促进、贫困治理、村民自治等工作,构建持续高效的乡村振兴帮扶机制和促进体系。

二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的根本措施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以科技创新、经营管理创新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发展设施农业、智慧农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农业新业态的形成和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

三要构建促进乡村振兴的新机制。深化农村市场化体制改革,破除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大市场。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益贫性经济增长。

(五) 始终坚持国际反贫困合作,为国际社会反贫困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是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追求,是各国政府以及全球治理的一件大事。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为国际贫困治理树立了典范。

一要积极参与国际反贫困合作,展现大国担当。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摆脱贫困的历程中,曾得到世界的帮助。从受援国到援助国,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走出了一条贫困治理的成功之路。当前,全球贫困治理创新需要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要进一步聚焦减贫、增长、全球治理三大迫切难题,讲好中国脱贫故事,推动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交流与合作。

二要支持国际减贫事业,服务外交大局。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力量,有助于集聚国际友善力量,增进和改善周边关系,在全球治理中赢得主动。以“一带一路”减贫合作为重点,把对外援助与减贫合作相结合,把民间减贫行动与企业“走出去”相结合,帮助沿线国家提升发展能力,实现互助共赢与可持续发展。

三要共建设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中国一贯倡导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挥了积极作用。要推动共建对话交流渠道,提出中国主张,形成国际共识。推动把可持续发展目标贯彻到多边和区域安排中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回望百年反贫困斗争史,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新发展阶段既展现了灿烂前景,也充满了风险挑战。在这历史关键时期,汲取党百年反贫困斗争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财富,转化为奋勇向前的斗志,转化为引领时代的能力,转化为开创未来的行动,党领导全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上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 蔡武 2006 《人权知识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 邓小平 200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2003 《2003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2015 《2015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3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北京: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
- 毛泽东,1991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任希贵,1994 “毛泽东对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龙江党史》,1994 6: 8—11。
- 王灵桂、侯波等 2019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实践探索与世界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吴国宝等 2018 《中国减贫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习近平 2020 《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21a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2021-01-12。
- 2021b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02-2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2021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人民日报》2021-04-07。
- 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 2021 “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求是》2021 4: 28—34。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19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16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17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1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201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2012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1 “用正确历史观看百年党史”,《求是》2021 3: 54—59。

The Mechanical Innovation and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of the CPC's Anti - poverty Fight in 100 Years

Luo Ya'na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Western Poverty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Xi'an)

Abstract: Through 100 years' anti - poverty fight, the CPC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in historically solving the absolute poverty problem that has troubled China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n building China into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he Party is committed to adapting Marxist anti - poverty theor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has explored the mechanical innovation of poverty governance in practice, and formed scientific and rich anti - poverty theories, policies and mechanic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will have deep signific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the steady and long - term progress of the Party's cause to summarize and advocate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spiritual strength, and theoretical fruits achieved in the 100 years' anti - poverty fight.

Key words: CPC; Anti - Poverty Fight; Mechanic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贾宇琰)